

《中西法律传统》

Legal Traditions of the West and China

2023年第2期(总第25期)

发现“湖北大学”时期的中国法制史教材：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的文本及其评析

郝虹延 李 力

摘 要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现藏两种《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是该校“湖北大学”时期出版的、由游绍尹主持编写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其一为迄今所见建国初期“五院四系”最早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其一为今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一本完整的中国法制史教材。作为1955年“中南政法学院”时期开设“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课程以来积累的教学成果，是今天考察法制史前辈学者在1950—1970年代建设法律史学科的重要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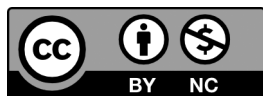
关键词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中国法制史教材；国家与法的历史

作者简介 | 郝虹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律史博士研究生；李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 的发现与问题的提出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们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发现两种自编的中国法制史教材。^[1]即：（1）《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1本，（2）《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2本，均铅印出

版于该校“湖北大学”时期（1958—1970年）。^[2]

由于手头有一篇未写完的文章，一直都在关注、收集建国初期（1949—1966）“五院四系”所编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因此对新发现的这两种教材产生研究兴趣。

1950—1960年代出版的中国法制史教材（或参考资料），只有北京大学法律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1] 作者在寻找图书资料时，得到法学院图书分馆程芳老师、首义校区图书馆王中婧老师热情而专业的鼎力帮助，谨此致谢。

[2] 关于“湖北大学”时期，详见栾永玉、杨灿明主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学术发展史（1948—2018）》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46—1547、1562页。

所编写的若干种。^[1]其余的大多是校内出版物,例如,目前可见华东政法学院、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自编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和参考资料。^[2]也有今仅存其书目、书影者。^[3]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馆藏的这两种中国法制史教材,几乎不为学界所知。

翻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学术发展史》,关于1950—1960年代法制史教材的编写情况,可见有如下的记载:^[4]

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卢干东、游绍尹、张梦梅等教师分别主持编著了《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国家与法的通史》《苏

联国家与法的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外国法律思想史》《毛泽东论国家与法》等教材和参考资料,成为学校和其他政法院系法律史教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其中的《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应该就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所藏的这两种教材。^[5]但关于这两种教材的具体情况,除了上述的校史之外,几乎未见有相关研究涉及到。因此,这两种中国法制史教材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由此或可揭开其法律史学科在“湖北大学”时期那段尘封已久、语焉不详的学术史片断。

[1] (1) 北京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编:《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参考书》第一分册,法律出版社1959年版。(2)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编:《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初稿)》第一、二、三分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3年4月/1965年4月/1965年9月。其中,第二、三分册的封面版式、版权页相同,但与第一分册的封面版式、版权页却略有区别。即,第二、三分册版权页在封底右下角,且均无第一分册版权页所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28号)”“北京市书刊出版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71号”,但是第二、三册都印有第一分册的统一书号:K6011·108。又,第一分册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及若干大学图书馆,第一、二分册在“孔夫子旧书网”可见,第三分册未见。人大法学院法律史博士生王牧云同学帮忙在其院图书馆检索该书信息,并拍第二、三分册封面、封底、目录页,谨此致谢。(3) 在“孔夫子旧书网”检索,可见A: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编:《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参考资料(现代史部分)》第一、二、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B:①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编:《中国国家和法的历史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56年3月。②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编:《中国国家和法的历史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政策、法令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56年4月。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编:《中国国家和法的历史参考资料(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56年8月。④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编:《中国国家和法的历史参考资料(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57年1月。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首义专业阅览室(二),藏有B之①③④;其南湖校区保存本阅览室(一)则有B之①。

[2] (1) 华东政法学院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组编印:《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参考资料》第一、二、三分册,1956年8月。(2) 北京政法学院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第一册,1962年9月/1963年9月。(3) 四川行政学院国家与法教研室编:《国家与法的历史参考资料(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政权与革命立法部分)》,1963年5月。案:这里的“四川行政学院”是西南政法学院的前身,或可称为西南政法大学的“四川行政学院”时期(1962.11—1964.6)。参见《西南政法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2010)》,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48页。(4) 西南政法学院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编:《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讲义(初稿)》,西南政法学院1964年2月,重庆。大32开,平装,330页。案:据西南政法大学校史(《西南政法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2010)》,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可知:1955年11月通过的学院1956年科学研究计划,将组织教师参加《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等教材的编写。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藏有(1)之全三册。通过互联网,在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检索其馆藏书目,知其总馆—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文库藏有(2),载体形态项:232页,26cm;索书号:D920.5/510-1,非可借。另,在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检索馆藏书目,知其沙坪坝区一三线路库藏有(3),其载体形态项:330页,25cm,在架,可借。

[3] 姜朋:《须有清风数后来——吉林大学法学院史稿(1948—1998)》,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58页,第75页图1-54。

[4] 赵凌云主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学术发展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页。又,栾永玉、杨灿明主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学术发展史(1948—2018)》上卷,第590—591页。

[5] 不知撰写上述两本校史的法制史学者是否见到过馆藏的这两本教材。又,游绍尹先生是中国法制史前辈,查阅这两本校史所收其小传,未见提及这两种教材。

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些稀见的中国法制史资料。例如，何仁俊在《中国法制史学研究（1949—1978）——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中心》中谈到：^[1]

教材是1949年至1978年中国法制通史研究的主要成果。这一时期，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是法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为了教学的需要，许多法学院系纷纷编写中国法制史的讲义和参考资料。根据笔者搜集的资料显示，这一时期至少有7个高校编辑过中国法制史教材，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湖北大学、吉林大学。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仅选取其中部分来进行说明分析。

其中的“湖北大学”，就是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湖北大学”时期。在这段文字之后，作者仅列举前揭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三册）、北京大学《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参考书》（第一分册），^[2]但未提供所谓“湖北大学”等其他5校自编同类中国法制史教材的相关信息。

作为考察建国时期中国法律史研究之学术史的代表作，马小红、张岩涛《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时代图景（1949—1966）》所举的例子，有前揭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自编的中国法制史教材或参考资料，^[3]但未提及“中南政法学院”自编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可见这也正是目前法律史学科发展之学术史前沿中缺失的一环。

客观地讲，“五院四系”的校内自编教材，大多受其性质、用途和发行渠道所限，当时就很难进入一般图书馆收藏的序列。即使通过今日发达的互联网旧书市场渠道，也不大容易见到其实物。因此，它们应属于珍贵稀见的文物级教材，具有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

以下，本文拟讨论的问题是：其一，“湖北大学”时期这两种中国法制史教材的文本及其史料价值。其二，其教材的主要内容及其学术价值。其三，这两种教材之间有何关系？它们在法律史学科发展史上占据怎样的位置。

二、《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的文本及其学术价值

（一）该教材的文本及其史料价值

在校图书馆“馆藏书目”检索该书，可获得其

书目信息。^[4]摘录其中相关内容制成表1，再将该书相关书影制成图1（以下相关书影，均为笔者所拍）。

表1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之书目信息

题名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 上册
责任者	湖北大学法律系
出版社	编者
出版年	1960.1
载体形态项	110 页，20cm
个人责任者	湖北大学法律系
中图法分类号	6（3）17



图1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之封面、封底及其版权部分放大书影

核该校书书目信息与其封面、封底，可知表1“馆藏书目”有关信息欠准确。在此，尝试补正如下：

[1] 何仁俊：《中国法制史学研究（1949—1978）——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中心》，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中国法制史研究方向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王立民，2015年4月，第15页。

[2] 其文中仅提供北京大学编写的第一分册的出版信息，只字未提中国人民大学所编三册的出版信息。

[3] 马小红、张岩涛：《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时代图景（1949—1966）——马列主义方法论在法律史研究中表达与实践》，载《政法论丛》2018年第2期，第134、137、138、142、143页。亦可参见叶秋华、赵晓耕：《守千古之常，发一时之新——记人大法律史学科六十年》，载《法学家》2010年第4期，第19页。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史编写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史（1950—201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3、59、77、96、98、99页。

[4] 其“馆藏信息”为：索书号，6（3）17/5；条码号，00041395；馆藏地，首义专业图书阅览室（二）；流通类型，可阅览；流通状态，在馆。

(1)“题名”，脱落“讲义”二字，应以该书封面所见者为准，即《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又，书脊上未印有书名。

(2)“责任者”，应以封底版权部分的文字为准：湖北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的理论和历史教研室。

该“国家与法的理论和历史教研室”，是“湖北大学”时期所设教研室之名。其前身，即“中南政法学院”时期的“国家法权理论与国家法权历史教研室”(1955年9月)、“国家法权理论与历史”(1956年4月)、“马列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和历史教研室”(1956年5月)。至1969年，合并为“国家与法的理论教研室”。^[1]

(3)“个人责任者”，其“前言”未说明。在此或可推测：游绍尹在其1950年代编写油印本基础上，主持编写该铅印本。^[2]

(4)“出版社”，应以封面所见“湖北大学”为准，具体如封底所见即：湖北大学教材出版科出版。

该“教材出版科”，应是当时湖北大学负责出版教材的专门机构。但是，不清楚其书号的批准机构是否该“教材出版科”。当时在湖北省或武汉市相关政府部门备案吗？不过，由此至少可确知，当时学校方面对于教材出版的管理是相当规范的。

(5)封底最下边的两个戳记即“60 7 20”，或许是该书在入藏图书馆时所盖的印记，表示入馆藏的时间。

又查，在湖北财经学院图书馆所编《馆藏法学与法律书目(中文部分)》之中，可见如下信息：^[3]

6(3) 17/5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

湖大 该校 60.1

这个记录与表1及表2该书封面所见相关信息吻合。据此，可推知该教材在“湖北大学”时期只出版了上册。这是一本没有写完的中国法制史教材。

以北京大学法律系编写教材的情况作为参照，有助于确定这本《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的史料价值。

在北京大学法律系所编《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参考书》之“说明”(其编者写于1958年5月)中，其前两段文字如下(尤其是笔者所加的下划线部分)：^[4]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是政法学科的一个部

门。内容非常广泛。主要研究近四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经验；研究党和毛泽东同志如何在各个革命时期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同时，也要揭露和批判我国历史上各种剥削类型的国家与法的实质，并阐明其发展规律。这对武装我们政法工作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我系同学在学习这门科学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些困难，除“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是解放以后才开始创建的一门比较年青的科学，目前尚无教科书这一原因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史料浩繁，而迄今又缺乏科学的整理。为了帮助同学解决这一困难，我们不揣简陋，特将我国历代有关国家制度和法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史料，按照我们的教学体系，分为：奴隶占有制和封建制部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部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加以编辑，作为我系同学学习这门课程的参考书。

第一段，阐明“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这门课程的性质、主要内容及其重要意义所在。当时，在“五院四系”这门课程的属性及其主要内容均如此。这是因为，1956年高教部开始颁布包括“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课程在内的教学大纲，并组织各法律院系教师编写该课程的教材。^[5]

第二段，简要介绍设立这门课程的背景及其教学大纲的体系，尤其是当时同学们所面临的两个主

[1] 栾永玉、杨灿明主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术发展史(1948—2018)》下卷，第1583、1541、1562页。

[2] 详见何勤华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8、19页。

[3] 湖北财经学院图书馆编：《馆藏法学与法律书目(中文部分)》，1982年版，第49页。

[4] 北京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编：《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参考书》第一分册，“说明”。

[5] 详见李贵连等编：《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1904—200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西南政法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2010)》，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付子堂主编：《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科史稿(1950—2020)》上册，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71页。案：感谢赵天宝教授帮助复制最后一本书。

要困难：一是“目前尚无教科书”。二是“史料浩繁”且“缺乏科学的整理”。而编写这个参考资料的目的，就是为了暂时可以解决这两个困难，便于这门课程的教学与学习。所谓“目前尚无教科书”，当指无铅印教科书。据其院史可知，1959年编有油印教材（祝总斌），直至1961年仍使用油印讲义。^[1]因此，北京大学法律系在1950—1960年代没有出版过中国法制史铅印教科书。这是确定无疑的。

“湖北大学”时期所编的《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应当是按照高教部统一教学大纲编写的，是今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最早的一本自编中国法制史铅印本教材（未完成稿）。^[2]即使就“五院四系”而言，可能也是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本中国法制史铅印本教材。铅印出版中国法制史教材，在1950—1960年代比较罕见，而能保留至今的则更属于珍稀之文物，因此其史料价值之高是不言而喻的。

（二）该教材的篇章结构、主要内容及其学术价值

该教材由“前言”和正文九章组成。将其体例结构制成表2如下。

表2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之篇章结构

前言		1-4 页
第一章	殷商奴隶制国家与法	5-17 页
第二章	西周初期封建制国家与法	18-28 页
第三章	春秋战国封建割据时期的国家与法	29-34 页
第四章	秦汉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形成时期的国家与法	35-43 页
第五章	隋、唐、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发展时期的国家与法	44-59 页
第六章	明清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时期的国家与法	60-70 页
第七章	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家与法	71-83 页
第八章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政权和立法	84-102 页
第九章	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国家与法	103-110 页

从总体上看，该教材有这样的几个特点。

（1）“前言”分为两个部分，其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其第一段就开门见山地就此阐明如下：^[3]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新建的一门科学。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大理论家，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着和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本课程的教学和研究，从内容到方法，都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毛主席著作作为纲，以党的方针政策为依据，这是我们所必须坚决遵循的。

在此基础上，确定该课程的研究对象是“国家与法”这一具体的历史现象。这是“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与“旧中国的所谓法制史”的根本区别。这与前掲北京大学法律系所编《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参考书》之“说明”是一致的表达：“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要“研究党和毛泽东同志如何在各个革命时期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

这充分表明，“湖北大学”时期的“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这门课程，已基本上摆脱苏联法学的影响，正在尝试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教育之路。

（2）该教材是一个未完成稿本。但据其“前言”即可见本课程的总体架构设计：^[4]

中国历史上共有下列各种不同性质的国家与法律：奴隶制国家与法，封建制国家与法，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国家与法，旧民主主义革命政权和法（存在时期极为短暂），人民民主政权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和法。

以此对照该教材正文九章，可知其未完成的就是“人民民主政权和法”这一部分。如果与下面要讨论的《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对比，这一点就更为明显。

（3）该《上册》的结构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

[1] 李贵连等编：《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1904—2004）》，第226、231、244、245页。

[2] 与该教材配套的课程学习参考资料有，湖北大学编著：《法律课程学习资料》第六辑《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湖北大学1960年10月。127页，20cm。索书号：D（9）0-42/4（6）。馆藏地：南湖社科法学阅览室，可借阅；保存本阅览室（一），可阅览。多次查寻但未找到，而其他五辑均在架。

[3] 湖北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的理论和历史教研室编：《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上册），湖北大学1960年1月，第1页。案：原文为“本课程的教学是和研究”，“是”为衍文，引用时径删。

[4] 湖北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的理论和历史教研室编：《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上册），第2页。

其一，全书没有设置“目录”一项。其二，在“章”之下，“节”的设置不统一。全书仅有第一章、第八章之下设有“节”。例如：

第八章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政权和立法

第一节 太平天国的革命政权和立法（1850—1864）

第二节 戊戌变法（1898.6—1988.9.27）

第三节 辛亥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1—1912）

由此可见，设置“节”的标准不一。尤其是，第八章之第三节后的时间界点采用不同的标准，并且其第二节有讹误“1988”，但当时并未校对出来。又，在其他七章之下，则设（一）（二）等。例如：

第二章 西周初期封建制国家与法（公元前1066年？—公元前770年）

（一）殷商奴隶制国家的灭亡和西周初期封建制的形成：

（二）西周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

（三）西周的国家制度：

（四）西周法：

（一）为标题，相当于“节”。但其句尾不必使用冒号，其他章亦见有使用句号“。”者，这属于不规范使用标点。这种体例上的缺陷与编写上的粗糙，令人怀疑该教材是否由游绍尹一人完成的。或许这就是当时教材编写之真实水平的体现。

无论如何，这本教材是迄今可见到其实物的最早的一本中国法制史铅印教科书，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时期法律史学科发展历程中，乃至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法律史学科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的文本及其学术价值

（一）该教材的文本及其史料价值

在学校图书馆“馆藏书目检索”，可见有2本《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以下简称A本、B本）。

摘录检索到的该教材A本、B本的书目信息，制成表3、表4。再将A本与B本的封面、封底等书影，制成图2、图3。

表3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

A本之书目信息^[1]

题名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 初稿
责任者	湖北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的理论和历史教研室编
出版社	湖北大学
出版年	1964.6
载体形态项	180页 25开
个人责任者	湖北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的理论和历史教研室编
中图法分类号	6(3) 17

表4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

B本之书目信息^[2]

题名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
责任者	湖北大学编
出版社	湖北大学
出版年	1964.6
载体形态项	180页 20cm
个人责任者	
中图法分类号	D(9) 0-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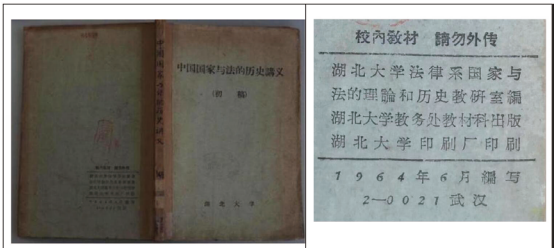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A本封面、封底、封底版权部分放大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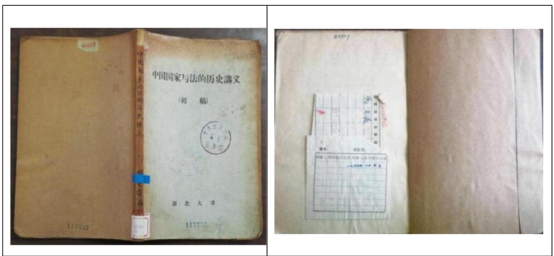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B本封面、封底以及读者借书卡插袋页书影

[1] 其“馆藏信息”为：索书号，6（3）17/5-2；条码号，00054033；馆藏地，首义专业图书阅览室（二）；流通类型，可阅览；流通状态，在馆。

[2] 其“馆藏信息”为：索书号，D（9）0-43/61；条码号，Z41500181；馆藏地：保存本阅览室（一）；流通类型，可阅览；流通状态，在馆。

比较表3、表4、图2、图3，则可以获得如下这样的几点认识。

(1) A本“馆藏书目”信息与其实物所见一致。而B本“馆藏书目”信息，其“题名”与封面所见有别，无“(初稿)”二字。两者全书均为180页，其内容相同，应属同一版本。

(2) 表3与表4，除了“出版年”，其他各项信息均不同。或许是两个校区图书馆由不同登录者所为的结果。

(3) A本索书号，采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分类法(由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制，1953年出版，17大类，标以阿拉伯数字1-17)，其中：6，是“法律”类。B本索书号，则采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北京图书馆发起编制，1975年出版，分22类，以汉语拼音字母作标记符号)，其中：D，为“政治、法律”类。

(4) A本与B本封面的版式相同。另外，其书脊上部均有手写体的书名(无“初稿”二字)，B本书脊下部可见有“湖北大学编”(其中“北”字被贴签盖住)，A本书脊下部仅可见有“湖”字(其他被贴签盖住)，推测与B本所见相同，下边应是“北大学编”4字。

(5) A本封底右下角印有版权的相关内容，而B本封底则无。不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又，A本封底版权部分的上方有一“特本书库”之印，可能是在某个时期被纳入特本书库保存时所盖的。

(6) A本版权页最下面一行字：“2—0021 武汉”，可能是当时武汉使用的书号或者在武汉市政府主管部门登记版权的一种编号。这与前揭《上册》版权页的格式也不同。

(7) B本书后保存有一张读者借阅卡(下图)，由其记录明确可见：①1964.6，180面。②不知何故，其左上角索书号与其“馆藏书目”信息不合，却与A本“馆藏书目”信息相同。或许其“馆藏书目”信息所见索书号“D(9)0-43/61”，可能是1975年之后按照“中图法”新编的。③该书B本在1978—1980年代期间仍是重要的教学用书。其中，(1979年)1月15日曾被当时在校读书的张明楷(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法学专业78级本科生。今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1])借阅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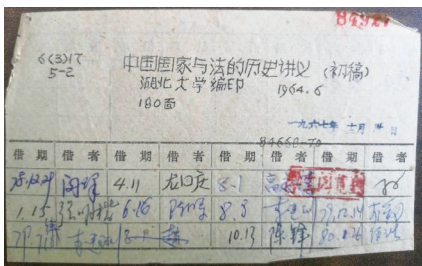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借阅单

又，在湖北财经学院图书馆编《馆藏法学与法律书目(中文部分)》中，可见有：^[2]

6(3)17/5-2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

湖大 该校 64.6

由此可知，该教材曾在1980年代初期被湖北财经学院图书馆编目整理过。

作为判定该教材文本之史料价值的根据，在此选择两个观测点作为比较的参照体。

其一，是(1963.4—1965.9)公开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所编《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初稿)》第一、二、三分册。其二，是1963—1966年北京大学法律系这门课程一直没有出版铅印本教材。在1963年教学计划中，这门课程已改称为“中国法制史”(蒲坚、范勛之)，但“困难也是明显的”，“1963年9月给新生开课时，大多数专业课并没有正式教材”，“中国法制史”也名列其中。^[3]由此可见，“湖北大学”时期能够编写并铅印出版这本中国法制史教材，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其史料价值就在于，该教材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迄今所见第一本完整的中国法制史铅印本教材，即使在“五院四系”中，也是不可多见的自编中国法制史教材。由此可以审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制

[1] 详见栾永玉、杨灿明主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科学发展史(1948—2018)》下卷，第1356—1357页。

[2] 湖北财经学院图书馆编：《馆藏法学与法律书目(中文部分)》，1982年版，第49页。案：该书现在只收藏有两册，一册在首义校区图书馆，一册在南湖校区图书馆保存本阅览室(一)。这里所使用的是后者。

[3] 李贵连等编：《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1904—2004)》，第250页。

史学者在“湖北大学”时期所达到的学术水准。

(二) 该教材的篇章结构、主要内容及其学术价值

该教材由“前言”和正文四编、共十九章组成。将其篇章体例结构制成表5如下。

表5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之篇章结构

前言		1-3 页
第一编	中国奴隶社会时期的国家与法	
导言		4 页
第一章	中国氏族制度的解体与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夏	5-8 页
第二章	商朝奴隶制国家与法	9-14 页
第三章	西周奴隶制国家与法	15-23 页
第四章	春秋时期国家与法	24-26 页
第二编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国家与法	
导言		27-28 页
第一章	战国时期的国家与法	29-32 页
第二章	秦汉国家与法	33-42 页
第三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国家与法	43-48 页
第四章	隋五代唐的国家与法	49-60 页
第五章	两宋国家与法	61-65 页
第六章	辽金元的国家与法	66-71 页
第七章	明清国家与法	72-82 页
第三编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国家与法(上)	
导言		83-84 页
第一章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的国家与法的变化	85-99 页
第二章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和法	100-103 页
第三章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04-107 页
第四章	北洋军阀反对政权和法	108-112 页
第四编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国家与法(下)	
导言		113 页
第一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政权和法	114-121 页
第二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国家和法	122-155 页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与法	156-166 页
第四章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政权和法	167-180 页

首先,将“湖北大学”时期的《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与《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联系起来审视,就可判断这是前后相承的两本教材。

即,两者的关系是:前者是初步尝试编写的未完成稿本,难免留有仓促、粗糙之痕迹。后者则是在前者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增订的最终完成稿本,较为完备而且成熟。这种关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察。

其一,《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

的“前言”,直接源于《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的“前言”,并有删节和修改。例如,坚持“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强调“必须按照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党的方针政策为依据”。^[1]笔者所加的下划线部分,就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新增加的文字。

其二,《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的篇章虽设置统一,但在“章”以下仍有设置不一致之处:①自第三编之第二章开始,每“章”之后有“结束语”。②只有第四编每章之下设置“第一节”“第二节”,前三编则无“节”,直接设“一、”“二、”。很可能是这种情况:这些部分由不同作者承担写作工作,但是最后统稿时却仅整齐到篇章这个层面。

其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第三编之第四章“北洋军阀反对政权和法”,到第112页为止。这个篇幅与《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第九章“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国家与法”,到第110页为止)篇幅大体一致。《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以增加新章、分解旧章的方式,从《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的九章,扩展到《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第三编为止的十五章。

其四,《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第四编(共四章),是此次新增写的,其体例与前三编不同。推测其作者可能是此次新参加撰写工作的。^[2]

其次,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初稿)》(三册)为参照,有助于判断当时法律史学界编写中国法制史教材所达到的学术水平。这一点可从该教材第一分册所见编写“说明”观察到。该“说明”短小精悍,特抄录如下:^[3]

一、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是一门新的学科,目

[1] 湖北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的理论和历史教研室编:《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湖北大学1964年6月,第1页。

[2] 该《初稿》编写工作可能仍由游绍尹先生主持,但推测其作者恐怕不止一人。待考。

[3]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编:《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初稿)》第一分册,“说明”。

前还在创建充实过程中。编写一部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讲义，不是少数人在短期内所能胜任的。但是为了教学的急需，我们特在原有讲稿的基础上，参考有关的历史著作和兄弟院系的有关教材，编写出这部讲义（初稿），一方面作为暂用教材；一方面作为讨论初稿，向同志们征求意见。本书无论在章节体系的安排或材料的引用上，以及在具体内容的论述上，还有许多需要深入探讨。再加我们的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恳切希望同志们提出批评指教，以利将来作进一步的修改。

二、本书暂分四编和三册出版：即第一编奴隶制时期，第二编封建制时期，第三编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第四编人民民主政权（1949年以前）。第一、二编为第一分册；第三编为第二分册；第四编为第三分册。

三、本书由以下几个同志分工编写：

第一编、第二编——张晋藩

第三编的第一章、第三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曾宪义

第三编的第二章、第四章——范明辛

第四编的第五章、第四编——张希坡

在第一段中，只有“法权”这个词带有苏联法学的遗迹。此外，有两个信息值得关注：一是“在原有讲稿的基础上”，二是参考“兄弟院系的有关教材”（应是指北京大学法律系所编，两校法律系在1950年代有比较特殊的关系）。

第二段文字交代该教材的四编、三册体例。即：第一编“中国奴隶制国家与法权”，下设四章。第二编“中国封建制国家与法权”，下设八章。第三编“中国半殖民半封建时期的国家与法权”，下设八章。第四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民民主政权和人民民主法制”，下设四章。其体例统一到篇、章、节。其中，不一致之处有两点：一是第一编仅第一章（“中国氏族制度的解体与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夏”）不设“节”，内容太少的缘故。二是仅第四编体例为篇、章、节、目，而前三编只统一到“节”。

第三段为写作分工，这种署名方式在当时的出版物中也是极为少见的，为今天研究学术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这三册《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初稿）》是1960年代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中国法制史教材，

即使以现在所见教材的标准来衡量，其篇幅之大也可算是一部巨作。^[1]

“湖北大学”时期这本《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其篇幅虽然不到中国人民大学三册本中国法制史教材的五分之一，但其涵盖的课程知识体系大体一致，唯其各章的内容比较精悍、简洁。

1963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初稿）》第一分册出版。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所见该教材第一分册就是“湖北大学”时期所购藏的。据此判断，在编写该《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时，其编写者游绍尹等很可能参考了中国人民大学这本第一分册，包括四编体例的设计，尤其是新增加的第一编第一章“中国氏族制度的解体与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夏”（较之《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其章名几乎一致，引用的主要材料和观点也无甚区别。《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初稿）》第一分册对“湖北大学”时期这本《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的直接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湖北大学”时期《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或可被视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初稿）》第一分册在京外法律院系的一个子产品。由此可见当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发展的进程路线及其所到达的学术水平。这正是《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四、余论

关于“湖北大学”时期这两种中国法制史教材，本文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如下。

（1）《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湖北大学1960年1月出版。为游绍尹在其1950年代油印本基础上主持编写而成，是迄今所见建国初期“五院四系”最早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时期法律史学科的发展历程中，乃至在新中国的法律史学科史上都具有重要

[1] 第一分册，322页，24.3万字；第二分册，358页，26.9万字；第三分册，382页，28.9万字。共计：1062页，80.1万字。

的学术价值。

(2)作为《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的续本,《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于1964年6月出版,游绍尹主持完成。这是迄今所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一本完整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在当时的“五院四系”也是不可多见的中国法制史教材。由此可以审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制史学者在“湖北大学”时期所达到的学术水准。

(3)“湖北大学”时期这两种中国法制史教材,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发展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即,它是1955年“中南政法学院”时期开设“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这门课程以来不断积累起来的成果。^[1]在此基础上,1982年“湖北财经学院”时期游绍尹、吴传太《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简史》出版。^[2]据此,可以窥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法制史前辈学者在1950—1970年代努力探索建设法律史学科的之一斑。

(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时期的法律史学科,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法教育的‘工作母机’”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3]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具体而言,成立于1950年12月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4]直接影响到京外法律院系的法律史专业师资队伍和教材建设等方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时期的法制史学科,其主要师资(张梦梅、游绍尹、杨堪等)

均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其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材建设等更是直接以中国人民大学的为示范榜样而完成的。^[5]

最后,顺便谈一谈在收集这些珍稀法律史料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体会与想法。其一,目前学校图书馆所藏1950—1960年代法律书籍(分类号“6”,或“D(9)”),其存放状况不尽如人意:或没有空调恒温,或放置混乱,很多书已陈旧残破不堪。其二,建议尽快组织力量立项进行抢救整理工作,以及时清理保护这些法律书籍,但不限于法律史学科的书籍。其三,或者放入学校的档案室,或者存入校史馆,或者在图书馆设立特本藏书室,同时进行数字化处理,以便研究者使用。

王家范在《百年史学建设历程回顾》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6]

世纪即将煞尾,很自然就想到“百年总结”。一位中年学者对我说,他认为无论哪个领域,都必须认真读他们的原书,该读的都必须读完,然后各自从个案分头做起,前后左右摸清底细,才可能为写出有质量的百年学术史提供条件。此说极有见地,我是十分赞同的。

本文也认同此说,并努力尝试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时期出版的法制史铅印教材实物入手,试图尽可能摸清学术家底,为写出有质量的法律史学科史片断提供条件。

[1] 详见赵凌云主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学术发展史》,第219页。

[2] 游绍尹、吴传太:《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前言”第2—3页。

[3] 徐平:《必须肯定政法教育的革命意义》,载《政法研究》1957年第5期,第19页。

[4]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史编写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史(1950—2015)》,第299页。

[5] 详见刘可凤主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史》,第95、96页。

[6]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337页。